

1952年,北京召开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4年后,为了纪念这次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主办、共有37个国家378名代表出席的国际和平盛会,华懋饭店正式易名为“和平饭店”。

这幢见证过炮火也见证过荣耀的建筑,本身就充满了传奇。

## 海上记忆

本报记者 沈轶伦

1

无论何时去南京东路外滩,这里都是人头攒动。

越过中山东一路眺望黄浦江,浦东陆家嘴高楼矗立,展示着上海的速度和信心。而观察这幅城市美景的绝佳位置,无疑是位于南京东路20号的和平饭店。

转动厚厚的旋转门,走入这家老牌五星级酒店,地毯吸音,人们走路轻轻。尤其入夜后,整个饭店都安静下来。但酒店8楼的龙凤厅却一直热闹,有人等座,有人聊天,有人布菜,菜肴的热气袅袅腾腾。年轻的龙凤厅的掌勺人、和平饭店国宴级中餐厅行政总厨马浩成觉得,这样很好,“中餐厅要有中餐厅的烟火气”。

许多老上海对龙凤厅的记忆都与生命中一些幸福欢乐的场景有关:孩子的周岁宴、喜气洋洋的婚宴,还有全家大团圆的寿宴。

主持人曹可凡在《记忆里的上海先生》一文里提到,喜欢结交文人雅士的魏绍昌先生曾请画坛“四老”谢稚柳、唐云、吴青霞、张乐平同聚,地点就在和平饭店。

这场聚会发生在1990年。根据卢金德1990年9月刊在《解放日报》的一篇题为《清雅韵浓同庚会》的文章中的描述,这四位老先生都生于宣统二年(1910年),属狗,这年正逢八十多岁。另有同样肖狗的美学家蒋孔阳、语言学家濮之珍、电影表演艺术家秦怡,及京剧演员陈朝红、漫画家沈天呈、评弹演员沈世华、作家丁言昭等作陪。那天,四老同聚,张乐平是漫画家,兴味很浓地在谢老的山石上补上了一对灵芝草。

时任和平饭店总经理赵锡堃认为:“这次聚会非‘和平’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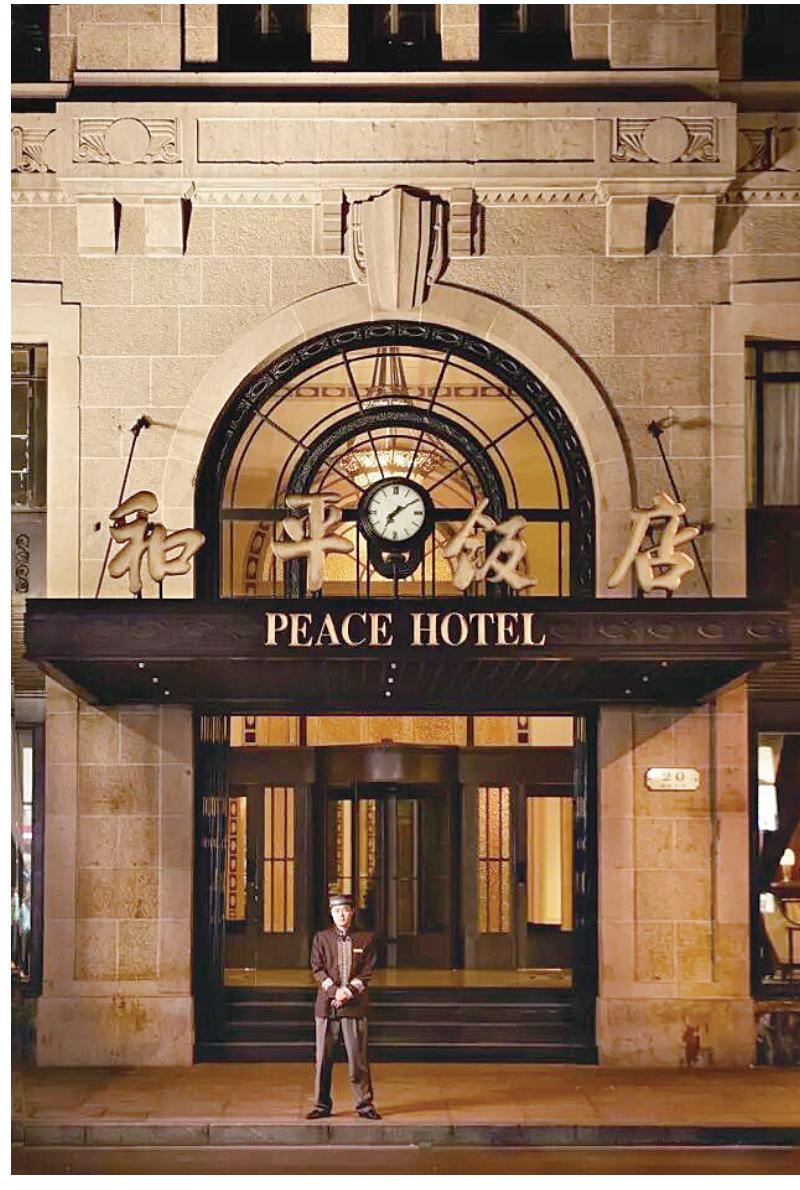
2

为什么“非‘和平’不可”呢?“和平”这个自带祥瑞的名字从何而来?

和平饭店北楼由外商在华兴建,原为华懋饭店,总高77米,临黄浦江面为13层,墨绿色方锥体屋顶如黄浦江边的一颗绿宝石。

开业于1929年的饭店,外部用花岗石饰面。

# 和平饭店为什么叫“和平”



和平饭店

员扒开街上一个个流血的身体,挑出还有希望救活的……”(《中国时代》[上卷]师永刚、邹明主编)

落弹事件发生后,华懋饭店和汇中饭店被震碎玻璃的橱窗都钉上了板条。此后,战火再未引入公共租界。(《80年前,南京路外滩落弹之谜》潘逸华)

1952年,北京召开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1956年,为了纪念这次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主办的大型国际会议,华懋饭店正式易名为“和平饭店”。1965年,汇中饭店改为和平饭店南楼,并重新对外营业。

3

马浩成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毕业后在粤菜馆汉宫开始职业生涯,之后在多家五星级酒店工作。

21世纪之初,正是中国餐饮江湖方兴未艾之际,来自五湖四海的饭店如雨后春笋出现在上海,也将各种餐饮管理方式引入这座城市。

当厨师需要精湛的烹饪技艺,当行政总厨就不仅需要会做菜、品菜,还要能识人,要学会团队管理、成本控制、新菜研发等。“行政总厨看的是综合能力,不能有短板”成了马浩成对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如今,他依旧每天上灶烧菜,也会在结束工作后,带着团队小伙伴去城里的小馆子吃夜宵——来是为了凝聚团队精神,放松心情,了解大家近期的所思所想;二来也是从不断

推陈出新的街巷菜肴里了解消费者的口味风向,寻找新的菜肴灵感。

如今,马浩成的工作室门口挂着好几块牌匾,有市总工会颁发的“上海市工匠创新工作室”,有市人社局颁发的“上海市技能大师工作室”,还有和平饭店所属锦江国际(集团)颁发的“上海市首席技师工作室”等等,他还曾获得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上海工匠”等诸多荣誉。

不久前,一位粉丝百万的美食博主来龙凤厅吃饭,马浩成为他烧了熏鱼。外国食客不喜欢鱼刺,而传统制作熏鱼的草鱼多硬刺,所以马浩成将熏鱼的食材改用为鲳鱼。在重要的宴会中,它还会用银鳕鱼,既保留了熏鱼的“形”,也创新了熏鱼的“核”。

考虑到西餐

里的龙虾汤和中餐里的虾汤异曲同工,马浩成把蛤蜊、鲍鱼、帝王蟹的腿等放在汤盘里,春到江南时,将绿色的豆瓣汁混合上黄油和奶油,上桌时淋上去,颇有海派餐饮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风味。

早在1993年的新闻报道里,就记载了一件和平饭店龙凤厅的小事:

英国商人、香港亚资软件有限



和平饭店的装饰艺术利用几何形状和线形对称塑造自信、优雅、力量的平衡,它的灵感来自古阿兹特克及古埃及的几何图形。

公司副总经理霍姆布莱克先生来沪办理商务时,与两位同事到和平饭店龙凤厅就餐。席间,为眺望外滩的景色,他特地换了个座位,用餐完毕与同事匆匆离座而去,把一个装有巨额公款的手提包遗忘在原先的座位旁。饭店的领班和服务员在报告了餐饮部领导和饭店保安部后,一起打开手提包查看,内有2600余美元、近万元兑换券和3张信用卡,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另外还有1张飞机票和1张香港居民身份证。后来发现了包内有客人下榻宾馆的信封,与该宾馆总台联系后,将包完璧归赵。

这件小事让外国客人连呼“终生难忘”。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件件小事中,上海给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和回味,也从侧面加强了来华投资者对上海的信心。

如今,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便捷支付消费场景更加普及,上海街头的外国游客身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和平饭店,仔细观赏老建筑的外立面和内部的格调。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会按图索骥,根据社交媒体的推荐和平饭店吃一餐上海菜——毕竟,沉浸式了解一座城市的文化,置身于本地人中间,去感受一顿美食,永远是最好的选择。

而这幢见证过炮火也见证过荣耀的建筑,本身就充满了传奇。



和平饭店于1929年8月1日开业,原名“华懋饭店”,又名“沙逊大厦”。 图片来源:公众号“上海和平饭店”

## 腌笃鲜

### 崇明山歌有“尾巴”

■柴森熊

2021年5月,崇明山歌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不过,很少有人知道,崇明山歌竟然还有“尾巴”。

20世纪80年代,笔者曾参加过当时崇明县的民间文艺三套集成(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的普查。在进行田野作业采风时,笔者对好多当时尚健在的民间老艺人进行访谈,了解到崇明山歌的演唱形式有独唱、对唱和群唱。崇明乡间把喜欢演唱的人称之为“唱山歌人”。

其中,独唱以山歌中的四句头山歌为多。那时,崇明民间山歌独唱者中,男声演唱者比女声演唱者多。究其原因是,旧时候女性不宜抛头露面,因此即便是女腔的山歌,也大都由男性唱山歌人演唱。这些歌者多为“三郎”——即耕田郎、挑担郎和摇船郎。无论是在河道水面上行船、地头阡陌小路上挑担,还是在田间块地上劳作,他们兴致所至就会放开喉咙高唱,既为解乏又为娱身。

当然,女性也唱山歌。但是她们一般不会像男性那样在大庭广众下演唱,而是农闲时分聚在一起纺纱、扎鞋底时,或在田间干以女性为主的农活,如拔秧、锄草、采棉、剥玉米粒时,一边忙活一边吟唱,所唱的山歌既有抒情的,也有叙事的。抒情的山歌多为四句头山歌,亦即四句为一组。叙事的山歌较长,都在十多句乃至几十、上百句。

山歌开唱时,一般只有一两个人,唱的时间一长,听众被激发出了兴趣,便加入进来,参与一起演唱,形成了山歌群唱的局面。最典型的是在崇明四句头山歌中的基本调演唱时,前三句都由一个人独唱,亦即领唱,到第四句时,旁边聆听的人主动加入进来,与领唱者一起唱。崇明人把这种参与进来一起唱山歌的演唱称为“抬山歌尾巴”。

那时,农村里夏天的晚上,人们在乘风凉时,常有沟东沟西两个生产队的人比试着一起唱山歌。大家比试着哪个生产队唱的山歌数量多、音量大,哪个生产队里“抬山歌尾巴”的人多,声音响亮。崇明人形容“抬山歌尾巴”时还有这样一句俗语,叫“声音响来三条泥沟四条港”,意思是说远地方的人都能听到“抬山歌尾巴”的声响。

如今,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力度的加强,崇明山歌又日渐兴旺起来。山歌演唱中的独唱、对唱、盘歌、对歌形式又现身于民间舞台,“抬山歌尾巴”的说法也应该会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 刊登内容

金银首饰 百货卖场 休闲旅游  
儿童用品 食品餐饮 建材装潢  
体育健美 超市促销 家具厨卫  
家用电器 婚纱摄影 品牌人物  
酒类饮品 医药保健 教育出版

电话: 021-22898598

### 全国范围的大会战

在8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毅等中央领导纷纷向刘杰询问原子弹研制进展情况,希望中国早日拥有原子弹,增强军事实力,提高国际地位。陈毅早在1961年北戴河国防工委工作会议期间就表示,脱了裤子当掉,也要把我国的尖端武器搞上去。此后,他多次对聂荣臻风趣地说:“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现在还不太硬,你们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就硬了。”

刘杰深感责任重大,时不我待。二机部领导认真学习了北戴河会议精神,并深入分析了核工业建设现状和原子弹研制进展,认为核工业建设和原子弹研制已经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刻,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提出一个新的目标和规划。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刘杰就上述认识和想法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信进行汇报。会议结束后,二机部领导经过反复研究和仔细推敲,于1962年9月11日向中共中央提交题为《1963、1964年原子武器工业建设、生产计划大纲》(简称《两年规划》)的报告,报告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1962年10月10日上午,聂荣臻和解放军总参谋长兼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简称国防工办)主任罗瑞卿在国防科委听取刘杰、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朱光亚汇报二机部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规划设想。整个规划分为5个阶段,其中用15个月时间完成原子弹产品的技术设计,用21个月时间准备完毕,进行试验。

### 为国铸盾 中国原子弹之路



不久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1964年10月19日听取国防工办关于原子弹工业建设和原子弹研制情况等问题的汇报。刘少奇主持会议,聂荣臻、罗瑞卿等列席会议。刘少奇认可二机部提出的《两年规划》,并指示:要努力搞,1964年能爆炸很好,如果努力了还不行,1965年也可以。各部的配合很重要,中央要搞个委员会,现在就搞,抓紧了就有希望。你们提出个方案和名单,报告中央批准。

会议一致批准了二机部提出的《两年规划》。经过多次讨论,罗瑞卿于1962年10月30日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写了《关于加强原子弹工业领导问题的报告》。报告说:“最近,二机部在分析了各方面的条件以后,提出力争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但在国内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而且在国际上也会产生巨大影响。实现原子弹爆炸,是全国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水平的集中体现,绝非哪一个部门所能单独办的。除二机部外,还必须取得各工业部门、科研单位的密切配合,以及全国在人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援。现在

离预定的爆炸日期只有两年的时间,为了更有力地保证实现这个目标,建议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加强对原子弹工业的领导,随时检查督促计划执行情况,并在必需的人力、物力上进行具体调度,及时解决在研究设计和生产建设中遇到的问题。这个建议,少奇同志已原则同意。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我们考虑最好是由总理抓总,贺龙、富春、张爱萍、任长、一波、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等参加。”

1962年11月2日,邓小平审阅罗瑞卿的报告后批示:“拟同意。送(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核阅。退瑞卿。”11月3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这一指示成为中国原子弹工程加速推进的总动员令。根据中央关于加强原子弹工业领导的决定,中共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于11月17日正式成立,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主持召开第一次会议。中央专委由周恩来、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

孙志远、段君毅、高扬共15人组成,周恩来任主任。1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的决定》。

中央专委发挥了组织执行原子弹研制总动员令的总指挥部作用。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作为日常办事机构,由罗瑞卿担任主任,赵尔陆、张爱萍、刘杰、郑汉涛任副主任。办公室附设在国防工办。在周恩来和中央专委的组织领导下,围绕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和试验,开始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大会战,先后有二机部、中国科学院、冶金部、化工部等26个部委及2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包括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参加了攻关会战。

从正式成立到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九次中央专委会议和若干次中央专委小型会议,及时解决了生产、科研和建设中的一百多个重大问题。

中央专委成立后很快就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1962年11月29日,中央专委第二次会议决定加强二机部的科技力量和党政工作力量,限令各有关部门、部队和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于12月底前为二机部选调各方面优秀人才500名,调配仪器设备1100多台。12月4日,中央专委第三次会议原则同意二机部提出的《两年规划》。周恩来在会上要求努力争取实现1964年目标,并说“科学是有规律的,要找到它的规律,掌握规律。实验工作要不怕失败,多次实验求得成功”,提出要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质量第一,安全第一,认真抓紧,踏踏实实地努力工作。在中央专委坚强有力的领导下,中国原子弹研制计划开始加速推进。

(三十) 连载